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四方面军卷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四方面军卷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十四部分文章 54 篇

十四、其他

红军长征过藏区

天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世界的红军长征已过去 50 多年了。长征的胜利，是我国各族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共同奋斗、英勇献身的历史丰碑，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的光辉范例。在永垂史册的壮举中，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的红军战士，我愿把自己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写出来，以唤起过来人们的战斗热情，激励后来者的奋进脚步，也为研究历史，为长征树碑立传的人们作参考。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藏族人民日夜盼望光明和解放

1917 年，我出生在四川省“四土”藏区（“四土”就是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四个藏族土司管辖的地方，在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党坝的一个贫苦藏族农民家里，父母早亡，我和两个弟弟生活无着，受尽了人间的折磨，大弟流落他乡，乞讨为生，二弟被人拐卖到草地。为了生活，我只好到本乡一个喇嘛寺当扎巴——供人驱使的未取得喇嘛称号的苦役。那时，我们藏族人民多么盼望脱离苦海。可黑暗的日子哪里是尽头啊？那时，四川藏区以及滇、甘、青藏区，都处于帝国主义、国民党

军阀和土司头人的严酷统治之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集历史上反动统治手段之大成，对国内各少数民族，说“民族平等，五族共和”，实则实行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他们一方面采取“怀柔羁縻”、“以夷治夷”和宗教麻痹的政策，利用高官厚禄收买、扶植藏族的土司、头人、活佛，帮助政府统治、剥削劳动人民；一方面又实行血腥镇压，武力封锁，并且严禁藏汉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制造民族间的壁垒，破坏民族团结。尤其毒辣的是，他们还加紧推行其强迫同化政策，把民族问题简单地称之为“边政问题”，不断地制造民族纠纷，挑起民族内部的冤家械斗和血亲仇杀，以削弱直至消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军阀和官僚对藏区的经济掠夺亦十分猖獗。他们相互勾结，毁我们的神庙，占我们的田地，挖我们的金矿，掠夺我们的财产。苛捐杂税、无偿劳役名目之多，难以计数。1914年甘孜藏区上交税收总数为20万元，1927年即增至33万元，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便激增至50万元以上。在我的家乡阿坝藏区，四川军阀设置茂县、汶川县局，霸占群众的土地。对当地出产之药材山货和进口之边茶、布匹、铜铁器、杂货等，实行垄断专卖，牟取暴利。他们还致力于保持藏区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并使之永久化，让藏族民众永远沦于半开化的地位。这就更加重了藏族人民的苦难。英帝国主义也在甘孜藏区加紧侵略。他们增设据点、领事，以外交官身份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同时设立教堂，蛊惑人心，仅康定教区就有大批外国传教士频繁活动。一些外国银行、洋行、商号，也在藏区设立派遣机构，操纵金融，垄断土特产收购，倾销洋货，大肆进行经济掠夺。

正当我们藏族人民陷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苦难深渊的时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徐向前、贺龙等同志率领的一、四、二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先后来到了我的家乡阿坝、甘孜藏区，解放了川边和阿坝各族人民。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革命实践活动

我们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藏族人民虽然盼望解放和光明，但是红军到来之前，对共产党和红军并不了解。我们只是风闻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领袖是朱毛。我当时还认为朱毛是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是朱德和毛泽东两个人。在此以前，我们藏语中也找不到共产党、红军等词汇。何况，当红军来到我们“四土”藏区前，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勾结土司头人妄图进行武装阻击；另一方面散布谣言恐吓群众，说什么“红军是红头发，来了要开红山、杀人”等，并大肆挑拨民族关系，驱逼群众离寨上山，不准在村里留下粮食和牲畜，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妄图置红军于绝境。因此，群众心里对红军还存在着疑惧。

但是，谣言和迷雾很快就被事实驱散了。红军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特别是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自治政策，打土豪（汉官军阀、地主、反动土司），分田地，遵守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深得藏族人民的欢迎和爱戴。人们奔走相告：“救苦救难的活菩萨降临了！”一些躲避到山林里的群众在红军模范行动的感召下，都逐步返回了家园。就我亲身的见闻，红军在藏区主要进行了以下的革命实践活动：

1. 主张并实践民族平等、团结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在旧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处于西南、西北边陲的广大藏族人民，横遭摧残和镇压，受到百般歧视和侮辱，藏汉民族之间的隔阂也较深。中国共产党则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主张民族平等、团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云南、西康藏区后，也曾宣布：境内藏、汉、回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禁止

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任何人不准称呼藏族同胞为“蛮子”；号召各族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友爱，共同反抗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建立回番民族自己的政府，管理回番民族的事。

红军不仅大力宣传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而且积极实践。贺龙在滇、康藏区，曾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名义庄严声明：“本军以扶助番民，解放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幸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安居乐道，勿惊惶逃散，……”同时，他还亲临云南省中甸喇嘛寺，向藏族僧侣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并题赠一副红布横匾，上书：“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绥（靖）、崇（化）藏区也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格勒得沙政府（格勒得沙是嘉绒藏语，“格勒”，藏民的自称，“得沙”是民众之意。“格勒得沙政府”就是藏族人民政府之意）。在康北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波巴（藏族自称）自治政府及其所辖各县、区、乡波巴政府，使藏族人民破天荒第一次实践了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

2. 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党和红军深知宗教的产生、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而西藏佛教在藏族人民中又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宗教问题实际上已和民族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红军一到我们家乡立即郑重宣告：“回番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准许人们信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反对伤害回番民族的宗教感情等。

红军进入藏区后，规定部队不得进入喇嘛寺，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的封门“神符”和红布条。贺龙、关向应都十分尊重喇嘛，叮嘱部队尊重藏民的信教自由。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甘孜特颁发

布告说：“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不得侵扰，此告！”署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政治部李”。

红二、六军团进驻西康省乡城县，王震、萧克同志亦非常尊重藏族人民的信仰自由，他们还向桑披喇嘛寺的纳瓜活佛赠送了一面锦旗，上书“扶助藏族解放”。

波巴自治政府不仅在革命政纲中规定：“信教自由，还俗自由，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没收。”而且张贴出保护寺庙的布告，颁发了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宗教法规——道孚县波巴政府关于喇嘛寺暂行条例。

3. 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保护群众利益

民族的习俗反映了该民族的传统和心理素质，这和民族的语言文字一样，都是民族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尊重藏族的习俗和语言文字就是尊重藏族人民。为此，红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各部队每到一个地方，立即派出人员深入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藏区就曾把调查到的藏族性格与习惯、历史沿革、社会制度、土质气候、耕种收获、家庭、宗教、婚丧、忌讳、买卖借贷以及挖药、打猎与工艺等情况编印成《情况通报》，供干部执行政策时参考。

红军十分尊重藏语藏文，提倡汉族指战员认真“学习番民语言”。请喇嘛教授藏语、藏文和藏族的歌谣、优待通司。发布的通告有的同时用藏汉文对照。红军还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通俗的歌谣来唱。这与国民党政府歧视藏语藏文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和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注意保护藏族人民的利益。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草地，二、六军团进入滇、康藏区时，缺粮问题都相当严重。为了不侵犯少数民族人民的“一丝一粟”利益，红军颁发了保护藏民利益的布告，在藏民青稞地里插上保护牌，责令一

切部队不得侵犯。红军总政治部在我家乡发布的《关于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中规定得尤为详尽具体：

“（甲）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乙）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丙）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麦子的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丁）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戊）收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

4. 坚持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

长征时期的民族统战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在党和红军颁发的文告，如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都有明文规定。

根据党的统战政策，红军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曾传六等，都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与藏族的公属领袖订立了各种政治的或军事的联盟。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在康北就与藏族大头人夏克刀登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并吸收夏参加了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的领导。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曾传六多次与四川黑水藏族头人苏永和进行谈判，依靠党的民族政策借路北上，并互赠礼物以示友好和亲善。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甘南藏族卓尼土司杨积庆在红二、四方面军到达时，主动撤出迭部辖区的防务，将鹦歌花园的两个粮仓贮存的40万斤小麦用来接济过境

红军，红军总政治部在仓板上写下“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同时留下苏维埃纸币两捆以作粮款。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受命赴康，曾率部阻击红军，被俘后送红四方面军总部，态度顽劣，红军考虑到他是一位年迈的藏族宗教上层人士，王维舟等领导亲自向其宣传党的宗教统战政策，以除疑惧。诺那态度转变，与红军亲善友好。后来诺那染疾病故于甘孜县，红军又尊重其遗言，按藏族习俗和宗教规矩，停尸、念经、火化，并派代表前往致哀。

此外，红军在协助藏族人民建立各级自治政府时，也都注意了吸收当地的土司头人、喇嘛活佛中的爱国人士参加。党的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最顽固的敌人，保证了红军顺利地越过藏区并播下了革命火种。

5. 帮助藏族人民建立第一批红色政权

党和红军十分重视帮助藏族人民建立民族自治政权。在红军的帮助下，藏族地区破天荒第一次建立起一批民族自治政权，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1935年夏天，在川西北懋功、瓦钵梁子等地建立的藏族苏维埃；

1935年秋，在卓斯甲周伞地区建立的藏族苏维埃，主席甲着喇嘛，军事部长瓦士匹；

1935年秋，在丹巴县建立时县、区、乡各级苏维埃，县苏维埃主席曾广才；

1935年底，在绥（靖）崇（化）地区（今金川县境）建立了格勒得沙政府。该政府辖绥靖、崇化、懋功、马尔康、丹巴、阿坝等藏族聚居区。政府的领导成员，主要由当地民族的进步青年、与民众有联系的上层人士以及红军中熟知地方工作的代表组成。政府主席是克基，副主席是杨海山等，内务部长阿木参，我当时任青年部长。

1936年春，在泰宁（乾宁）巴里秋卡等六个乡建立的波巴自治政府，

主席仁钦多吉（王寿才）。

1936年夏，在川边藏区的甘孜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及其所辖的甘孜、炉霍、道孚等县、区、乡各级波巴政府。该政府有明确的施政纲领：推翻军阀官僚统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没收他们的金厂、矿山、土地分给波巴人民；实行民族平等、自主，成立波巴自卫军，波巴坐自己的江山；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解放奴隶，保护妇女儿童；与抗日红军订立永远的盟好，无条件的为红军筹军粮、马料，调派向导，救护伤病员等。波巴政府还有一套较完整的有效率的组织系统，中央政府设主席（多德）、副主席（达吉、孔撒），尚有总务厅、农业部、畜牧部、民族部、宗教部、军事部（部长夏克刀登）等。

各自治政权的负责人多数由各族人民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其民族成分和阶级成分，以藏族的农奴为主体，并注意吸收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因而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受到群众的衷心爱戴，被称为“自己的政府”或“郎加尼玛夏”（天上出来的太阳）。

跟随红军北上抗日

正是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在红军的教育启发下，我们这些原来什么也不懂的藏族青年，第一次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知道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和红军这样的好人。因此，我们都把红军看作是“菩萨兵”，自觉地为他们送粮草，当向导，报告敌情，救护伤病员，协同红军作战，并踊跃参加红军。仅丹巴县巴底乡参军的就有270人，我家党坝乡参军的少先队员就有72人。从此，红军里有了第一批藏族战士。

我就是在“相信红军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可以信得过”的信念下，首批参加了红五军团。与我同时参加红军的还有原青海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扎喜旺徐、已故国家民委副主任杨东生和已故甘孜藏族自治州

州长沙纳等同志。少先队、革命军有自己的军纪和礼节，头戴没有帽沿的五星八角帽，行拳头军礼。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少先队、革命军不仅协同红军作战，而且经常主动出击，独立作战。记得在打几毛山土司武装的战斗中，为了掩护友军撤出阵地，我和吴瑞林率队绕到敌人右侧面袭击，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吴瑞林在战斗中负了伤。再如，有一次我们侦察获知，土司头人在金川与卓斯甲交界处藏有牲畜、粮食，于是我们主动出击，很快打垮了敌人，缴获了几十驮粮食、300多匹牛马，受到了金川省委军事部的通令嘉奖。

1936年秋^①，红四方面军总部集中大金、党坝、卓克基、卓斯甲、梭磨等地的革命军和少先队，组编成立了“藏民独立师”。马骏任师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金世柏任副师长。独立师与红军一道长征，其行动根据任务需要灵活多变，时而在前，时而断后，并精选出政治思想可靠、身强力壮、熟悉地形的同志为各路红军当翻译，作向导。独立师在协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征途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有的同志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军到达甘肃岷县时，独立师完成了北出藏区的使命，撤销了原来建制，干部、战士有的编入其他部队继续北上，有的自愿回乡坚持斗争。我随红军到达陕北。

党中央十分重视培养民族干部。在陕北定边县，中央党校成立了少数民族班，廖志高同志任班主任，我任班长。1937年初，中央党校迁至延安，党又专门为少数民族干部组织了第七班，我任班长兼学员支部书记。1941年，党又在延安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民族学院，我担任过学院的学生会主席。

在延安窑洞里，党的阳光雨露，温暖、培养着我们这些来自藏、彝、苗、回、蒙等各民族的干部战士，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进步很快。过去一字不识的我们，不仅学会了读汉语，写汉字，而且受到了马列主义

^① 另一说法，藏民独立师成立于1935年冬。

的启蒙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一批批党培养的民族干部，后来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红军长征过藏区这段光辉难忘的历程，使我更加坚信，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是全心全意为各民族利益奋斗到底的政党和武装。我也从自己切身的感受中理解了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解决我国复杂的民族问题，才能消除民族间的对立和隔阂，实现各民族真正的平等和团结。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历史功绩永存！

1987年7月于成都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89—96页。

天宝，又名桑吉悦希，藏族，1917年生，四川马尔康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任红五军团党坝特区少年队副队长、骑兵连指导员，金川博巴苏维埃政府青年部部长，博巴藏族独立师党代表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委副主任、西康省西藏自治区主席、四川省副省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08年在成都逝世。

21 担银元送陕北^①

吴光华

收缴“川陕边防军”银元100万元

1932年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十一、十二师，通过上、中、下都是70里的“巴山天险”，似神兵天降，直趋通江城、鹦歌嘴、得胜山，在许世友、程世才的指挥下，解放了我的家乡平昌县驷马乡，仅一个月就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四县。我参加了红军，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团四连当战士、班长、排长等职。红军解放江口（即平昌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电令四川军阀，立即停战，一致对付红军，委任田頌尧为川陕“剿匪”督办，麇集70个团向川陕革命根据地扑来，妄图将新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扼杀于摇篮中。川陕根据地军民在徐向前、王树声指挥下，1933年8月至10月，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解放了南至仪陇、蓬安、营山、渠县，西至广元、阆中、苍溪、嘉陵江东岸，北至陕南镇巴、西乡，东至达县、万源、与川东根据地联成一片，人口400多万，面积三万平方公里。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15个师、八万人，创建22个县一个市的革命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大区

^① 编者为原文略有修订。

域。达宣战役中，我军歼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六个团，俘敌 4000 余人，缴枪 8000 支、银元百余万元、机床 138 台、布匹粮食无数，江口地区各乡村参加背运人数达 3000 余人次。与陈锡联指挥我红二六三团突袭达县城东制高点凤凰山时，刘存厚得知他的部队垮了，浑身发抖，面色苍白，被侍从扶上马，狼狈逃窜，边跑边喝令“砍断浮桥”，溺死百姓不计其数；他又令“砍破麻袋”，马背上驮的银元撒落满地垫路，士兵谁也不敢拾银元，只顾逃命。这一仗，刘存厚“崇威将军”的招牌被打得稀巴烂，田颂尧被迫辞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之职，刘存厚被“革职查办”。1933 年 10 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司令”，率领 140 个团，25 万人对川陕苏区进行“六路围攻”，狂叫“三个月内肃清赤匪”。在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等指挥下，历时十多个月的反围攻，取得了著名的“镇龙之役”、“红云台保卫战”、“万源保卫战”（即万源竹峪关反击战）等的重大胜利，毙伤敌旅长以下官兵六万余人，俘敌旅长以下官兵二万余人，刘湘电告蒋介石：“官损五千，兵折八万”，“难复为续”，请辞“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我红四方面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 22 日党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入川，协同作战，向西线进攻，牵制川敌。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蒋介石加紧策划川陕鄂三省督剿，张国焘害怕川陕苏区成为蒋介石“围剿”重点，惊慌失措，在后方根据地大搞“收摊子”政策，叫嚷“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违反中央指示、擅自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历时两年多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遵照王树声副总指挥的命令，将红四方面军从达宣战役和其他战役缴获的百万元以上的银元和部分金条，除去川陕省造币厂（在通江城郊、德汉城，后移旺苍坝），军师首长命令铸造

银币及向白区购买物资用掉的银元外，余下的 21 担银元和部分金条，由我带领挑夫排担运，跟随部队开始了长征。1935 年 3 月 28 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在渡江战斗中，我们平昌县籍的一名红军战士，将平时节省的零花钱凑起的一块银元，装在胸部的兜袋中，抢渡嘉陵江桥头时被田颂尧部队的子弹，射中了胸部，恰巧这块银元挡住了这颗子弹，保护了这位老红军的性命，后来我们把这块银元叫“救命银元”。

彭德怀拒收张国焘银元200块

1935 年 3 月 29 日红四方面军渡江成功，历时七天，歼敌七个团，攻占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四座县城，连克江油、北川、茂县，占领了理番。5 月 18 日张国焘擅自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6 月 14 日在川西懋功（今小金）达维镇，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召开了庆祝大会，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在会上讲了话，在毛儿盖进行了休整。休整中周恩来同志登门看望了张国焘，意在团结他北上抗日。但张国焘的权力欲、领袖欲日益毕露。为了争得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之职，张去芦花镇，一会儿给周副主席送白糖木耳，一会儿特邀彭德怀、聂荣臻，一会儿会见林彪、杨尚昆，还专门让黄超（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叫警卫员拿银元 200 多块，向彭德怀表示慰问。黄超带警卫员送去了礼物，彭军团长只收了几斤牛肉和大米，200 多块银元叫黄超退了回来。据张国焘叛逃后揭露，张还特意交待：“可以从四方面军调三个师归彭指挥”。彭德怀对张国焘又是送礼，又是拨兵的举动，感到张国焘来意非善、居心叵测。